康有爲主持下的萬木草堂*

（一八九一～一八九八）

蘇　雲　峯

前言
一、康氏創設萬木草堂的動機與背景
二、沿革
三、組織及教育宗旨
四、課程
五、入學試
六、師生及其救國活動
八、結論

前　　言

清朝末年，在廣州城裏，有一所特殊的學塾，叫做萬木草堂。它的創設人就是後來領導戊戌變法的康有爲。

康有爲是一位理想家，亦是一位教育家，① 萬木草堂是他的政治運動的起點。

草堂設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被關閉於戊戌政變之後，數年間，憑康氏一人之熱忱與努力，因陋就簡，慘澹經營，培養了一批青年學子，對淸季的政治與學術，發生了波瀾壯闊的衝擊與影響。其故何在？値得探討。

淸代正統教育以書院爲主體，然書院自始卽爲科擧之附庸，專課八股，不講有用的學問。迄兩廣總督阮元創設學海堂（一八二四），專講經詁實學，不課八股

* 本文之作，承蒙張朋園、張玉法、郭正昭三位先生之修改指正。尤其是張朋園先生，沒有他的批評、建議與改正，本文將是另外一個樣子。謹此致謝。

① 梁啓超：「康有爲傳」，戊戌變法（上海，一九五三）册四頁36。

，發生了一次變革。以後亦有少數學者起而效法，然而由於政治上的禁忌，他們所講的「實學」與實際政治社會所需尚有很大的距離。這種趨勢，迄張之洞創設尊經（一八七五）、廣雅（一八八七）、兩湖（一八九〇）等書院，講授經世之學，為國家培養人才，才又往前推進了一步。張氏日後復設自强、農務等學堂，講授中西實學，並仿效日本，建立學制，清代教育至此始踏進現代的里程。然而張氏之貢獻多在於制度與科技，而於政治學術，則因缺乏自由開放精神，未曾發生深遠的影響。康有為創設萬木草堂，倡導討論批評，講解中外政治學術，又亟力主張學術領導政治，教育改造社會，教育思想，至此而大放光芒。故研究萬木草堂，可助我們了解近代教育思想之發展。

萬木草堂是康氏推進中國現代化的起點。美教授布拉克氏在現代化的動力一書中指出，一國之現代化過程大致經過四個階段：一、現代性的挑戰，二、現代化領導階層的鞏固，三、經濟與社會的轉變，四、社會結構的重組與整合。此一發展程序，是由政治之改革而導致經濟社會之變遷。布氏强調，一國現代化之成敗關鍵，在第二階段，即能否將權力由傳統領袖轉移到現代化領導階層手中，並將之鞏固②。準此以觀，則自康氏創設萬木草堂至戊戌變法的一段時期中，均屬於此一模型的第二階段。萬木草堂是康氏培養現代化政治幹部的場所，數年間，造就了一批人才。康氏就以之為骨幹，向外發展，影響一般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吏，再進而打動光緒皇帝。企圖由此而形成一堅强的領導階層，以推動全國性之政治革新。故研究萬木草堂，對了解戊戌維新運動，亦有所幫助。

一、康氏創設萬木草堂的動機與背景

康氏創設草堂的動機，直接係因不滿同光以來的政治學術風氣而起。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積極進取，平等博愛的學術思想體系，以負起領導政治革新的責任。同時培養學問淵博，思想自由，胸懷開闊，眼光遠大，勇於犧牲，能擔當大任的政治幹部，以從事實際政治改革，促進中國之富强康樂為最高境界。

② C.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p. 67-87。

康氏此一動機，與他的家庭、教育、遭遇、及其社會思想之背景有密切的關係。

康有爲（一八五八～一九二七）是廣東南海縣銀塘鄉人。他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的士紳家庭。祖父名贊修，是道光舉人，做過欽州、連州教諭。父親名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亦在銀塘教過書。其他叔伯輩多人亦以教書爲生。他在這樣一個「以教授世其家」的環境中，從小就表現出優異的領悟力，受到諸長輩的稱許。他早年的生活與教育，受祖父的影響甚大。十一歲那年，父親逝世，他離開家鄉，赴連州隨祖父讀書，三年中共計讀了綱鑑、大清會典、東華錄、三國志與明史等書籍，對歷史與政治發生濃厚的興趣。此外，還閱讀邸報，知道一些政治消息。由於他天資聰穎及其祖父的社會地位，而在連州官場與知識界中享有神童之名。在這種令人鼓舞的情景下，他日以繼夜瀏覽羣書，而與八股疏遠。③

康有爲自十三歲返回銀塘至十八歲的五年間，由於家庭的壓力，學習八股，準備鄉試。但他厭惡時文，無甚進步。因之三次鄉試都名落孫山，屢遭祖叔輩之譴責。④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經驗。他後來極力主張廢除八股，亦係種因於此。

康氏因受三次考試失敗的刺激，曾有放棄考試的念頭，俾專心研究實用的學問。這時影響他的，一是他的老師朱次琦，一是京官張延秋。朱次琦給他經世主義的思想；張延秋引導他進入實際政治。⑤

康從十九歲（一八七六）那年起，去禮山草堂從朱次琦（一八〇六～一八八一）讀書。次琦號九江，道光丁未（一八四七）進士，是廣東大儒。其講學主經世致用，不尙空談，破爲學漢宋門戶之見，而歸宗於孔子。嘗曰：

> 讀書者何也，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處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隨而應天下國家之用。⑥

九江以四行五學教弟子。四行即：敦行孝悌，崇尙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

---

③ 康有爲：康南海自編年譜（臺北，文海，民六一），頁2-5。

④ 同上書，頁5-7。

⑤ 康說：「吾自師九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傳」。有詩懷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國，拊心知己總酸辛」（見同上書，頁11）。

⑥ 「朱次琦九江學案」，在徐世昌編：淸儒學案卷一七一頁6。

。五學即經學、史學、掌故、性理與辭章。⑦這些教育主張，都被康氏所採用，而成爲日後萬木草堂教育綱領的主要成分。

九江的學問思想與講學時的方法與神采，對康有很大的影響。他回憶九江在禮山草堂講學的情形說：

> 〔先生〕日一登堂講學，諸生敬待，威儀儼肅，先生博聞強記，不挾一卷，而徵引羣書，貫穿諷誦，不遺隻字，學者錄之，即可成書一卷。……至夫大義所關，名節所繫，氣盛頰赤，大聲震堂壁，聽者悚然，爲才質無似，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爲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⑧

康氏在九江的教導下，勤奮攻讀三年，進步神速，孕發了獨立思維的能力。故在某些學術問題上，所見常與九江相左。如九江極稱韓愈，而康則謂韓愈道術淺薄。他認爲韓愈「但能言耳，於道無與」。他亦常批評宋明清諸文學大家，謂「皆空疏無有」。再者，九江喜程朱，「尚躬行，惡憚學」，而康特好陸、王與禪宗。自謂一日在堂中「絕學捐書，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爲聖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⑨充分表現了玆後獨立獨行的精神。

由於喜愛禪宗，康於二十二歲那年（一八七九），離開禮山草堂，到西樵山修佛學道，幾與人世隔絕。幸識朝士張延秋，深受其鼓勵而復有經世之志。並從此專心研讀中西經世實用書籍，四年間他讀了：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馬端臨文獻通考、經世文編、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全書、美人金楷理口譯西國近事彙編（按係一八七三～一八八一世界新聞摘要）、李圭環游地球新錄（一八七八）、魏源海國圖誌（一八四七）、徐繼畬瀛環志略（一八四八）與傳教士林樂知等萬國公報（一八七四～一八八三）。各國史志，及聲、光、化、電重學等書報，莫不一一瀏覽。此外並到香港、北京、上海等地旅行一次。對香港與上海二地市政之美，表示驚異。

---

⑦ 同上書，卷一七一，頁1-3，又康南海自編年譜，頁8。

⑧ 康有爲：「朱九江先生佚文序」（光緒三十四年），在康有爲：不忍雜誌彙編初集（臺北，華文，影印本）卷五頁15。

⑨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9-10。

認爲西人治理之善，必有其本，不能以夷狄視之。⑩

自廿七歲至卅歲（一八八四——一八八七）的四年是康氏奠定社會思想基礎的重要階段・他四年中的主要工作是將過去對儒佛道的研究心得、四年來的閱讀與見聞，一一加以消化整理，融會貫通，著作成書。其代表作有二：一是康子內外篇（一八八六），一是萬身公法（一八八七）。前者講天地人物之理，政教藝樂之事，是小康社會的理想，書中還提出一個具體的政治綱領及其完成目標。⑪ 後者倡導西方博愛、自由、平等、民主等觀念，⑫ 是他後來發展大同社會理想的基礎。綜合二書，可知他這時的社會思想，雖有些互相衝突與矛盾之處，但顯然有下列幾個特質：

㈠**進化的觀念**：三世之義的見解，此時已形成。⑬ 所謂三世之義，即認爲社會進化必經過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進化的程度以文明與財產所有制爲準。據亂世是「文教未明」的野蠻社會，升平世是「漸有文教」的私有制小康社會，太平世是「文教全備」的社會主義大同社會。⑭

㈡**自由平等的觀念**：康氏在萬身公法導論中，打破五常的傳統，主張「人有自主之權」，主張君臣平等，父子平等，長幼平等，男女平等。而對二千年來的學術與政治權威主義加以嚴勵的抨擊。

㈢**博愛的觀念**：康氏認爲孔教的兼善與佛教的普度衆生，皆由仁愛慈悲之心出發。由於仁愛之心，而不忍見江河破碎，人民痛苦，出而積極救國家、救人類，將此愛心推及天下。

㈣**人性可塑的觀念**：康氏認爲人性爲惡，其成材全賴後天教育的塑造。他說食色、喜怒哀樂，皆人類自然的賦性。這些賦性，如令其自然發展，則必產生互相爭奪、弱肉強食、喜怒哀樂無節的惡端。教育的目的在節制，或甚至轉移此一自然之稟性，滌去其惡端，長養其善端並充實其智慧與才能，俾爲人羣服務。他在康子內外篇「性篇」中說：

---

⑩ 同上書，頁11-15。

⑪ 康有爲：康子內外篇，「闔闢篇」，在清議報（臺北，成文，民五六）冊十一頁693-696。

⑫ 康有爲：實理公法（即萬身公法導論）。近史所藏膠捲。

⑬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17。

⑭ 康有爲：春秋董氏學（上海，大同譯書局，光緒二十三年）卷二頁 4 。

凡言乎學者，逆人情而後起也。人性之自然，食色也。是無待於學也；人情之自然，喜怒哀樂無節也，是不待學也。學所以節食色喜怒哀樂也。聖人調停於中，順人之情，而亦節人之性焉。惟佛則不然。人好食則殺禽獸，不仁甚矣。聖人知其不可，陰食之而陽遠庖廚以養其仁心，欺矣。佛則戒殺生不食肉焉；人好色則爭奪殺身忘親，聖人知其不可，陰縱之而陽設禮教以束縛之。夫色心之盛，豈能束縛？必至不義矣。佛則戒淫以絕之。……故佛者逆人情悖人性之至也，然而學之至也。⑮

以上所列是康氏三十歲（一八八七）以前的社會思想要點。康的社會思想，於三十歲時已成定型，以後雖略有變動，實則不出此範疇。⑯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康氏應張延秋之邀，帶着這些理想與抱負前往北京。時值中法戰後，國勢日蹙，又親見北京官場之腐敗，乃憤而上書，呼籲改革。因書中嚴厲批評京朝風氣，無人代奏。大失所望，乃決心返粵，從事教育與學術工作。萬木草堂，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二、沿　革

康有為返粵後，初在廣州城徽州會館協助石德芬⑰講授詩文課程，因而得與左近學者接觸。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三月，陳千秋聞康上書請變法事，嚮往康氏，遂來請見。康氏「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羣之原，破棄考據舊學之無用。」千秋折服，六月拜為弟子，是為康氏的第一位及門者。八月千秋介紹梁啓超來見，亦折服於康的學問而離開學海堂，拜康為師。由於陳、梁二人的建議，康氏乃於十七年（一八九一）在長興里設堂講學，是為萬木草堂之始。康氏著「長興學記」，作為教育綱領。初時學生不多，除陳千秋、梁啓超外，又加上韓文舉、梁朝杰、

⑮ 在清議報，册十五頁962-4。

⑯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商務，民三六）頁149。關于康有為的社會思想的精闢分析，請參閱 Hsiao Kung-chuan, *"In and Out of Utopia: K'ang Yu-wei's Social Thought"*, Chung Chi Journal, Vol. 7, No. 1 (Nov. 1967) pp. 1-13。

⑰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22。石德芬，原名炳樞，番禺人。同治十二年舉人，光緒元年學海堂專課肄業生（見學海堂志增頁2）。

徐勤、麥孟華（原在學海堂）、曹泰、王覺任、韓銘基等人。⑱康氏一面講學，一面著書，忙於充實草堂。七月，得陳千秋與梁啓超之協助，完成「新學僞經考」。此書認爲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僞造，主張經學面目應恢復到西漢時之舊觀。⑲出版後雖遭到廣雅書院院長朱一新的駁斥，但仍在各書院流傳，引起政府的注意。十八年（一八九二），遷講堂於衞邊街鄺氏祠，或因學生增多之故。「孔子改制考」一書之雛形亦在這時形成。此書大旨「以六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託；而先秦諸子，亦罔不託古改制。」⑳托古改制的理論基礎於是時奠定。是年於草堂以孔子紀年，恢復古禮，仿製古樂，並設立學長，而以陳千秋任之。十九年（一八九三）多，再遷講堂於府學宮仰高祠，懸匾額正式稱爲萬木草堂。學生每人酌收束修金十至二十兩不等，㉑而陳、梁二生則資助康氏租用仰高祠十年。㉒陳千秋與梁啓超同爲學長。草堂成立時，康曾捐贈「累代藏書」供諸生使用。是年因欲改草堂爲書院，擴大組織，延聘名學者講授中西之學，乃以一千二百元交由陳千秋選購圖書，充實典藏。後書院之議雖不成，草堂藏書却相當完備。約於同時，南海縣「團練局」官盜勾結案發，陳千秋主張干預，康氏重其言，而採取行動。是萬木草堂經世主張的第一次試驗。此事後節將作介述。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二月，康、梁師弟二人入京應試，但因「新學僞經考」一書被指爲「惑世誣民」，「非聖無法」而遭到焚燬的處分，粵士亦被禁從學，康乃於六月返粵。時梁啓超在北京，運動京官營救，進行困難，而草堂學生亦多不安，「咸言進呈」，爲梁所阻。梁云「原奏語甚辣，若有人從而媒孽，亦可召大禍」，康見事態嚴重乃暫避風險於羅浮山，迄九月始再回草堂。不二月，又與龍澤厚赴

⑱ 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在張伯楨：滄海叢書，輯二册6頁15-16。

⑲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頁11。

⑳ 同上。

㉑ 蔡俊光：記康南海與萬木草堂，在春秋雜誌，期八（香港，民46、11）頁10。

㉒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25。此外，草堂刻書，亦多賴徐勤資助。

桂林講學。後得「免被追究」。㉓次年，康又偕梁啓超與梁小山二人入京應試，而有四月公車上書之舉。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康氏重返草堂講學，時徐勤與王覺任爲學長，翌年（一八九七）正月，康氏復往桂林，六月返粤，「學者大集，乃晝夜會講」，不遺餘力。光緒二十四年三月，草堂曾一度「徒侶雲集」，聲勢浩大。八月，變法失敗，二十日，草堂被查封，王覺任、徐勤等均被通緝，情勢危急，王乃率諸生避居香港，徐則助康之家眷遷居澳門，幸免於難，惟所藏圖書三百餘箱均被毁棄。㉔草堂至此結束。

計萬木草堂自成立迄封閉，爲時凡六年三個月，康氏實際在堂講學時間約四年零八個月，餘皆風塵僕僕於南北道上。其離粤期間，課務先後賴弟子陳千秋、曹泰、徐勤、王覺任等代理。梁啓超在追思陳千秋時說，陳千秋與曹泰二人，「萬木草堂之龍象也。〔康〕先生講學數年，門人日進受業，苦不徧逮，而兩君實爲都講，答問析疑，悉當師說，草堂後進，受其裁成者過半。」㉕可惜二人命短，皆卒於光緒二十一年前。此後，則賴徐勤、王覺任等之協助。康亦曾說，王覺任於丁酉戊戌，「在萬木草堂爲學長，代吾講授領衆」。㉖諸種記載，反映出萬木草堂的發展，多賴得力弟子之承先啓後精神的表現。

三、組織及教育宗旨

草堂之經營既不受政府資助，亦未得紳商捐獻。其創辦經費，多係康氏自籌。學生不但沒有膏伙，而且還要繳費，有的還自動捐助租賃費用，出資刻書。由於經費短缺，所以組織非常簡單。康氏一人獨兼總教授與總監督之責，下設學長三至六人

㉓ 光緒二十年六月，康返廣東，梁啓超留在北京，迄十月返粤。七月給事中余晉珊劾新學僞經考，梁見勢不利，乃運動沈曾植、盛昱、黃紹基、文廷式等人電廣東學使徐琪營救，又請張謇、翁同龢等相助。但沈等電文抵粤後，總督李瀚章誤「伯熙」（盛昱字）爲褚「伯翊」。因褚時正彈劾李瀚章，李畏懼之，遂令康自行焚毁其書，餘不追究了事（見康南海自編年譜，頁28）。梁曾于二十年八月廿四日致康書，報告在北京營救的苦情（見近史所藏：諸家與康南海函札）。

㉔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38-75；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六，詩，頁19。

㉕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下簡稱梁譜長編）（臺北，世界，民四七）頁29。

㉖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六，詩，頁19。

，選高才生兼任，助理教授與行政。此學長制度，計分為博文科學長（協助教授與分校功課），約禮科學長（助勤勉品行，糾檢威儀）與干城科學長（主督率體操）。另設書器庫監督一人，負責管理圖書儀器。㉗這時廣州有二所官辦的書院頗稱完善，一是學海堂，一是廣雅書院。學海堂不設山長，而設分科學長八人，由各科名學者擔任，享有優厚的待遇。學長的職權相當於今日的科（系）主任，負責該科的教學、考試與膏伙等事。至廣雅書院，則在院長之下設分校四人。分校待遇甚高，每人月薪銀多達四十兩，另加火食補助銀十兩。學海堂與廣雅的學生，每月均有膏伙，每月至少二課，每課均有獎銀。相形之下，草堂至為遜色。不過，一所學堂的成敗，經費、組織設備固為要素，教育宗旨、教學內容與教師的熱忱尤為重要。草堂的教育則以宗旨與精神為其特色。

草堂的教育宗旨在重整學術、培養政治幹部、改造政治、拯救國家。

它不像當時的一般書院，以準備科舉考試為專務；不像學海堂，以培養考據家為目的；亦不像廣雅書院，以培養維持傳統社會秩序的人才為標的。

康氏認為學術、人才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正確的學術思想，可以培養優秀的人才；有了傑出的人才，始有完美的政治。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是一個內治不安，外禍頻仍的國家。際此之時，學術以考據為重心。作為社會中堅的知識分子，不埋頭於考據，便醉心於八股，對國計民生，無所關心。康氏認為，歸根結底，是學術走錯了方向。他認為二千年來的學術，不論是漢學與宋學，都走入了歧途，而忘記了孔子春秋經世的大道。其罪魁禍首，就是劉歆。因劉歆偽造毛詩、周官、左傳，且謂六經非孔子所作，貶黜孔子素王的地位，使學術不能領導政治。孔子的經世精神，改制主張，因此湮沒而不明。他說：

> 自戰國至後漢八百年間，天下學者無不以孔子為王者，靡有異論也。自劉歆以左氏破公羊，以古文偽傳記攻今學之口說，以周公易孔子，以述易作，於是孔子遂僅為後世博學高行之人，而非復為改制立法之教主。聖王祇為師統而不為君統，詆素王為怪謬，或且以為僭竊，盡以權歸之人主，於是天下議

㉗ 梁啓超：「康有為傳」，在戊戌變法，冊四，頁14。

事者，引律而不引經，尊勢而不尊道，其道不尊，其威不重，而教主微，生民不嚴不化，益頑益愚，皆去孔子素王之故。㉘

康氏認爲欲振興學術，非打倒劉歆之說，恢復孔子的地位不可。他主張六經皆孔子所作，欲明孔子的大道，唯有直接探究六經，而尤以易與春秋二書爲最。

康氏認爲，孔子的學問分爲義理與經世二類。弟子中得其全者僅顏子、子貢二人，其他弟子僅各得其部份。

義理方面，可以易與論語爲主要代表，大學、中庸、孟子爲次。不過，他說論語是曾子與子夏二家門人所集成的語錄，雖發揚了孔子的思想，而曾子主張修身寡過，子夏倡導守約之言，均不得孔子開濶的氣魄。故閱讀時，應取其積極進取的一面，而摒棄其消極保守的一面。讀孟子時，亦應摘取其捨生取義的恢廓精神，而揚棄其窮則獨善其身的狹窄觀念。㉙

經世方面，以春秋公羊、穀梁爲代表。他說，漢時公羊學以董仲舒爲師，穀梁以劉向爲師，史記與兩漢政議，皆以此爲本。但春秋三統之義，漢儒亦「罕有心知其意者」。漢以後，荀學居于統治地位，演變至清朝，學者專以訓詁名物爲務，更迷失其方向。康氏主張直接讀易經與春秋公穀二傳，以知孔子經世之意。㉚

康氏認爲孔子的哲學有下列幾個特點：

進步的，非保守的；兼愛的，非獨善的；

世界的，非國別的；平等的，非專制的；

强立的，非儒弱的；重魂的，非愛身的。㉛

孔子哲學的最高表現爲求仁行仁。而草堂的教育宗旨，亦在兼愛行仁。行仁的層次，自孝親睦鄰至救國救民，陽類天下。康氏在「長興學記」中說：

其仁小者爲小人，其仁大者爲大人。故孝悌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婣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鄉者仁之廣也；若能流惠于邑，則仁大矣。能推恩于國則仁

㉘ 康有爲：孔子改制考（臺北，商務，民五七），卷八頁1。

㉙ 康有爲：長興學記（廣州，萬木草堂，光緒十七年二月），頁21-24。此書，近史所藏膠捲。原文又見葉德輝：「長興學記駁義」，在蘇輿：翼教叢編（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卷四頁34-63。

㉚ 同上書，頁24。

㉛ 梁啓超：康有爲傳，在戊戌變法，册四頁15。

益遠矣；能陽類于天下，仁已至矣。㉜

就一國政治而言，能為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的政治，方為仁政。萬木草堂所要培養的，就是具備這種政治抱負的青年學者與政治人才。

四、課　　程

前面說過，康氏相信人性為惡，欲其成才，非加塑造不可。他的教育原則是以孔教調節其性，而以佛教悖逆其情，使之去惡遷善，並以西學充實其智慧與才能，以為人羣謀幸福。

康氏又認為人性是平等的。故就個人而論，其後來的成就，全視其逆于常緯的程度及其所學習之範圍而定。在「長興學記」中，他說：

夫勉强為學，務在逆乎常緯。順人之常，……則有聲色起居之慾，非逆不能制也；順人之常，……則有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擴也。……故其逆彌甚者，其學愈至，甚遠于人愈甚。㉝

在學習範圍方面，康氏主張通材教育。他說：

同是學人也，博學則勝于陋學矣；同是博學，通于宙合則勝于一方矣；通于百業則勝于一隅矣；通于天人之故，極陰陽之變，則勝于循常蹈故，拘文牽義者矣。㉞

基于上述通材教育的理論，草堂的課程，範圍廣博，內容豐富，融會儒、佛、中西學于一爐，而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其目的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以為救世之用。㉟

草堂的課程可分為哲學思想、史地學、數理化學、政治學、語言文字學與體育音樂六種，每種內容梗概如下：

㈠哲學：

㉜ 長興學記，頁4-5。

㉝ 同上書，頁3。

㉞ 同上。

㉟ 梁啓超：康有為傳，在戊戌變法，册四頁9-10。

孔學：講授春秋、詩、書、禮、樂、易六經大義，發揮春秋三世之義，孔子改制之意。康說：

> 必知孔子改制六經，而後知孔子之道，所以集列聖之大成，賢于堯舜，法于後王也。㊱

又說：「必知春秋爲改制而後可通六經也」。故先讀春秋，次及禮、詩、書，最後讀易。他認爲「易者義理之宗，變化之極，孔子天人之學在是，精深奧遠，經學于是終焉。」㊲梁啓超說康曾著「孔子民權義」一書，專門發揮孔子平等主義的精神。㊳此外，還講授論語、大學、中庸與孟子，亦以發揮其微言大義爲主，而揚棄其考據訓詁，如講孟子時，强調其民貴君輕的民主思想，擷取其講仁義、誅暴君、除汚吏的積極精神，以切合實際政治社會改革之需要。對少數高材生，則加講大同書，以建立其遠大的理想，展拓其眼界。㊴

佛學：在康氏的哲學思想中，孔教與佛教，二者始終相乘，有無相生，關係密切。他說：

> 今天下之教多矣，……然予謂教有二而已。……孔教率其始，佛教率其終；孔教出于順，佛教出于逆；孔教極積累，佛教極頓至。……人治盛則煩惱多，佛乃名焉，故舍孔教無佛教。……然天有毁也，地有裂也，……國有亡也，家有裂也，人有折也，皆不能外佛教也，故佛至大也。是二教者終始相乘，有無相生，東西上下，迭相爲經也。㊵

在教育理論上，康氏似乎傾向於採用佛教悖逆人性的辦法。佛學中，康氏尤好華嚴宗。故常對學生講授華嚴，發揮其積極入世，不惜犧牲，普度衆生，救人救世的精神。

周秦諸子學：發揚諸子創教改制的精神。

宋明學：講授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的哲學與宋、元、明、清四朝學案。宋明

㊱ 長興學記，頁26。

㊲ 同上書，頁27-28。

㊳ 梁啓超：「論支那宗教改革」，在清議報，册二〇頁1311。

㊴ 葉德輝：「長興學記駁義」，在蘇輿：翼教叢編卷四頁59； 又梁啓超有「讀孟子界說」一文， 發揮師說，謂孟子傳孔子大同主義。 其讀春秋，講仁義，主經世，皆大同主義之精神與極致 （見清議報册二一頁1373-76） 。

㊵ 康有爲：康子內外篇，「性篇」，在清議報，册一五頁963-4。

哲學中，康氏猶好陸、王，以其「直捷明誠，活潑有用」。康氏將陸、王思想與華嚴宗融合，作爲學生精神敎育的工具，以培養艱苦奮鬪，殺身成仁的勇氣。㊶

泰西哲學：講西方哲學思想。

㈡**史地學**：

中國史學：講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晋書、南北朝史、隋唐書等，于其制度文章，經義史裁之美，一一摘出發明。

萬國史學：講世界各國歷史，以政治史爲主，習俗與史事爲輔。

地理學：講世界地理與測量學。

㈢**數理格致學**：講乘除、開方、幾何、代數、微積分與淺近物理化學原理。數學後由三水何易一（字樹齡）講授，但常在堂上談嚴譯天演論。㊷

㈣**政治學**：

政治原理學：講春秋、公羊、穀梁，發揮進化的理論。

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講司馬光資治通鑑、馬端臨文獻通考、鄭樵通志中的二十畧（如禮、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等）與清代掌故。

萬國政治沿革得失：講世界政治與風俗。

政治實用學：

羣學：講合羣之道。鼓舞學者負起「先覺之任」，四出講學，結合「忠肝熱血」之人，組成團體，以「推行仁道，期易天下」。

㈤**語言文字學**：

中國文字詞章學。

外國語言文字學。

㈥**體操、禮儀、音樂**：

體操間日一次，又在庭前曠地上放弓弩石砧等器物，令學生課餘自由練習。另有兵操，在春秋二季舉行。習禮于初一、十五二日行之，分朝廷、祭祀、賓客等禮節。習禮畢，師生共同學樂。樂分樂音、樂器、樂舞三種。草堂收集仿製鐘、鼓、

㊶ 梁啓超：康有爲傳，在戊戌變法，册四頁8。

㊷ 蔡俊光：記康南海與萬木草堂，在春秋雜誌，期八頁10。

磬、琴、瑟、竽等多種古樂器。案開元詩譜唱詩，或唱詩經，或唱清朝樂章，而以管笙和之。樂畢，作投壺的遊戲，遊戲畢，開會討論平日聽講及讀書劄記。㊸

此外，學生每日尚有自修課程七種：讀書（分精讀、瀏覽）、養心（精神磨練）、治身（反省）、執事（草堂勤務）、接人，時事（國內外新聞）、夷務（洋務書籍）。㊹

由上述課程看，草堂學生學習的範圍非常廣泛。但康氏講課時採用綜合論述的方法，將各科性質相關者加以融會發揮，而歸結于救國救民的總課程目標。

在課程時效方面，康氏有一個進步的見解。他認爲學術與時俱進，今天的新理新制，明日或將成爲過時黃花，不足以適應新的需要。爲了使靑年學生，在學術上成爲時代的先導，他主張國家應將全球各國有用的書籍編製成目錄，供學堂參考。至各學科之教科書，則應每五年召集各科專家審議一次，推定新的教科書，供學堂採用。㊺

五、入　學　試

康氏于收弟子時，不用筆試，而採用彈性很大的面試法。面試的人數，每次只能一、二人；面試的次數一次或二次。每多長談，有談至十二小時者。康氏與準弟子面談時，除直接了解學生的身世與學問思想外，同時又告以自己的中外學術政治知識與主張，以探測學生的反應。如與陳千秋晤談時，他批評考據，讚揚孔子改制，並告以人類進化之理，合羣之原，天文地理，政治禮俗教育，以及三世之義，大同思想等。千秋折服，遂拜康爲師，爲康門之第一入室弟子。

關于與陳千秋晤談的情形，康氏記云：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三月陳千秋來見，六月來及吾門。……陳通甫又字禮吉（即千秋），時讀書甚多，能考據，以客禮來見，凡三與論詩禮，泛及諸經，吾乃告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羣之原，破棄考據舊學之無用，禮

㊸ 同上書，頁18-19。

㊹ 同上書，頁30。

㊺ 康有爲：實理公法，「教事門」。

吉恍然悟，首來受學，語及身世家難，哀感涕下，因以生死之理告之。禮吉超然，蹈道自在矣。凡論今古天下奇偉之說，諸經眞假之故，聞則信而證之。既而告以堯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聞則信而證之。既而告以人生馬，馬生人，人自猿猴變出，則信而證之。乃告以諸天之界，諸星之界，大地之界，人身之界，血輪之界，各有國土、人民、物類，政教、禮樂、文章，則信而證之。又告以大地界中三世，後此大同之世，復有三統，則信而證之。天才亮特，聞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氣剛而力毅，學者之所未見也。[46]

再者，與學生晤談時，康氏應用禪師刼祛「我執」的原理而以「嚴重迅厲之語，大棒大喝，打破其頑舊卑劣之根性。」換言之，他希望學生在心理上先否定「舊我」，然後才有接受新知識新觀念的可能。這是一項嚴重的心理考驗，因此不能接受者「一見便引退，其能受者，終身奉之，不變塞焉。」

如梁啓超記其與康面談時的感受說：

時余以年少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淸之。自辰（上午八至十時）入見，及戌（下午八至十時）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陳千秋）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敎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于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玆始。[47]

康氏之多得得力弟子，理由在此。

六、師生教學研習活動的特色

草堂師生的敎學研習活動，包括講課、著書、討論、自習、習禮、學樂等多種，雖無考試制度，緊張而活潑，繁忙而愉快。歸納這些活動，有下列數項特色：

㈠**講學認眞**：康有爲講學的方法與神情，多模仿其師朱九江，每日上堂講課不

[46]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22。

[47] 「梁譜長編」，頁15。

下三四小時。講課時非常認眞，「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別擇之智識亦從生焉。」㊽ 課外，學生或三、四人，或一人入室請教，亦往往由一問題論及另一問題，廣泛討論，深入分析。學生能質疑問難者，康氏更樂，談益起勁，而學生之獲益尤豐。康氏曾說他在草堂「常旣明而起，講貫至夜深」，㊾ 正說明了他課內課外熱心講學的實情。

㈡研究與教學密切配合：康有爲一面講學，一面研究，研究的成果，卽是講學的部份內容。他不僅自已作研究，而且鼓勵學生參與其事。師生合作無間，感情融洽。他在草堂的第一部著作，是新學僞經考，此書于光緒十七年由草堂出版。學生陳千秋、韓文擧、林奎、梁啓超等或協助編纂，或爲審校。㊿ 十八年編書達八、九種之多。孔子改制考卽于是年開始撰稿，康氏曾「選同學高才（陳千秋等）助理編纂」。此書于四年後出版時，協助校勘者，又增加王覺任、張伯楨等五人。[51] 此外，康氏又令韓曇輯逸周書、穆天子傳、山海經以證劉歆作僞；令其女同薇據廿四史編各國風俗制度考，「以驗人羣進化之理」。[52] 又選其他同學分葺古今禮說，編史記書目考，孟子大義考等書。十九年著孟子公羊學考，論語爲公羊學考。二十年著春秋董氏學，學生王覺任、康同勲、梁應騮與陳國鏞爲校勘。[53] 二十二年着手日本政變考與日本書目志。[54] 大同書之一部份雖迄民國二年才問世，然其初稿，則成於光緒十八年。陳千秋曾參與商榷。[55] 稿成，康曾令梁啓超等數人傳閱，從此「萬木

㊽ 同上書，頁17。

㊾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23。

㊿ 同上；又見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廣州，康氏萬木草堂，光緒十七年七月），卷終。

[51] 康有爲：孔子改制考，卷終。

[52]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24-25。

[53] 康有爲：春秋董氏學，卷終。

[54]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38。

[55] 「梁譜長編」，頁16。按大同書共分十部分，第一、二兩部，曾刊于民國二年的不忍雜誌，民國八年發單行本，全稿迄民國二十四年才由其弟子錢定安交中華書局出版。見大同書（北京，新華，一九五六）頁2。

草堂學徒，多言大同」。

由上列著述目錄，可見草堂師生研究的重心在駁斥劉歆，發揮春秋三世之義，孔子改制之意，贊揚日本明治維新與建立大同主義的理想。

㈢**討論、辯論與批評**：如同第一節所述，康氏在禮山草堂讀書時期，已有懷疑與批評權威的精神。在萬木草堂，即運用此種方法，敎導學生。草堂每月初一、十五，定期舉行學術討論會，討論內容爲學生平日聽講筆記與讀書劄記。討論時，康氏鼓勵學生辯論與批評，不但同學之間可以互相批評，即對古聖先賢，清朝學者，亦可批評，無須顧慮。他認爲學術隨時代而進步，知識隨時代而累積，「後人知識必勝于前人」。又基于人權平等的原則，他打破權威主義，而將眞理與偶像分開，主張對古今言論，以理爲衡，不以聖賢爲主。他在實理公法一書中說：

聖不秉權，權歸于衆。古今言論，以理爲衡，不以聖賢爲主，但視其言論何如，不得計其爲何人之言論。[56]

據此，聖賢亦可批評。就個人求學而論，康氏認爲唯有敢于懷疑與批評，始有進步。梁啓超回憶在草堂時的生活，謂其與陳千秋，學到這種精神，常到母校學海堂去批評舊學，與「長老儕輩辯詰無虛日」。他們每逢春秋佳日，十五月夜，常到粵秀山麓，菊坡精舍、紅棉草堂、鎭海樓一帶漫游。梁說，「每游率以論文始，旣乃雜遝汎濫于宇宙萬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終極。先生（康）在，則拱默以聽，不在，主客論難鋒起，聲往往振林木，或聯臂高歌，驚樹上棲鴉拍拍起。」[57] 梁後來在北京與夏曾佑、譚嗣同等人知交，亦每見面即談學問，爭辯不息。但爭辯的結果，雙方都有進步。[58] 後來即令在患難之中，梁仍認爲互相批評與辯論，可以保持團結。如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他于致康有爲書中勸康說：「萬不可以爲在患難之中，當互相涵濬，憚于爭辯也。」[59]

總之，在草堂裡，學生享受了相當程度的學術自由，精神解放了，學問自然進步，身心自然愉快。梁啓超說他們在草堂時，「無日不樂」，理由在此。

---

[56] 康有爲：實理公法，「師弟門」。

[57] 「梁譜長編」，頁16–17。

[58] 同上書，頁22。

[59] 同上書，頁109。

㈣**採用陸、王主靜與禪宗坐禪的方法，陶鑄品性，培養毅力**：草堂日課七事中有「養心」、「治身」二項。「養心」的目的，在培養「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倂識苦樂，毀譽得失」，置之度外的意志，以爲將來擔負起救國的重任。「治身」的目的在於自我反省，改正錯誤。前者在早上舉行，後者則在晚上就寢前爲之。「養心」的方法，是靜坐時「將死生患難體驗在身，在有如無，視危如安，至于臨深崖足二分垂在外，從容談笑」的程度。⑩這種方法，梁啓超等後來在湖南時務學堂等處，加以推廣，方法更加具體。據湖南時務學堂學約，「養心」的功課有二：一、靜坐之養心，二、閱歷之養心，每日作三十分鐘至一小時，靜坐方法又分爲兩種，「一斂其心，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一縱其心，徧觀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虛構一他日辦事艱難險阻，萬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極熟，亦可助閱歷之事。」⑪

至于「治身」的方法，長興學記言而不詳。據湖南時務學堂學約，治身于每日就寢時舉行，「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論行事，失檢者幾何，而自記之，……不可自欺，亦不必自餒。……」⑫

這種思想訓練的結果，雖未必能與實際情況的訓練相提並論。但在無法獲得實際經驗的情況下，亦未嘗沒有裨益。梁啓超等後來從事實際政治活動，頗受此影響，而且偶亦複習此養心治身之功課。⑬

㈤**合群的精神**：滿淸政府有見于明朝東林復社的敎訓，一向嚴禁學者「立會結社」，以禁阻知識分子互通聲氣，結成團體，批評朝政。而諸學者亦明哲保身，顧全生命于亂世，不敢有合羣的觀念。康有爲認爲這是知識分子自私自利的結果。他認爲救國救民的工作，需要許多有抱負有熱血的人參加，才能推動，所以强調合羣的精神。他在「長興學記」中說︰

仁爲相人偶之義，故貴于能羣，羊能羣者也，……犬不能羣者也，……吾旣

⑩ 長興學記，「養心不動」條，頁11。

⑪ 梁啓超：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在戊戌變法，册四頁501。

⑫ 同上書，册四頁502。

⑬ 「梁譜長編」頁120。

為人，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曰孤曰獨，惟鬼神之道，非人道也。嚴處奇士之行，寡過獨善之能比于木石乎？故胡文忠曰，今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卽佛氏空寂，亦言若不普度衆生，誓不成佛，未有以自了爲美者。㊹

爲了培養合羣的精神。康氏勉諸生要「相救相賙相親相葬，任于朋友，恤于鄉黨」，以產生利害相共的精神。草堂中的活動如討論、習禮、學樂、遊戲、兵操、郊遊等都是促進合羣的方法。救國的事業非常艱巨，單憑草堂的力量是不足擔當的，必須擴大影響，以求結合更多的「同志」，共赴國難。康又勉諸生說：

今上原周孔之意，推行仁道，期易天下，使風氣丕變。先覺之任，人人有之，展轉牖人，卽爲功德，推之旣廣，是亦爲政，則志士仁人講學之責也㊺。

陳千秋在「長興學記」跋中亦說，刋刻「學記」的目的，在：

廣告天下，庶綴學之士知所趨嚮，推行漸廣，風氣漸移，生民之託命，或有賴焉。㊻

草堂諸生，確是尊循此合羣的敎導，四出講學，去「廣宣敎惠」的。梁啓超在湖南時務學堂學約中說：

他日合天下而講之，是謂大羣；今日合一堂而講之，是謂小羣。杜工部曰：小心事友生。但相愛，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集衆思，廣衆益，學有緝熙于光明。㊼

時務學堂的羣育方法與草堂相似，但更爲具體。梁說：

樂羣之功課……每月以數日爲同學會講之期，諸生各出其劄記册，在堂互觀，或有所問，而互相批答，上下議論，各出心得，其益無窮。㊽

徐勤在橫濱大同學校亦提倡合羣之道。他說：

美洲以合羣而治，非澳羣島諸生番，以離散而見滅，蓋合則勃興也若此，不合則敗亡也若彼，合羣之效，已可觀矣。今中國危于累卵，强敵迫于虎視，

㊹ 長興學記，「廣宣敎惠條」，頁14。

㊺ 同上書，頁15。

㊻ 同上書，「跋」，頁31。

㊼ 在戊戌變法，册四頁504。

㊽ 同上。

……瓜分之局，即在須臾，……然上下昏痺，莫克振救。……自頃湘省有南學會之設，桂省有聖學會之舉，彬彬濟濟，士氣丕厲，……然以齊州之大，民類之繁，僅此區區，其亦九牛一毛，泰山之拳石耳。……凡我神明之冑，遠遊之民，其無同心乎？㊾

㈥**關心國計民生**：萬木草堂的教育宗旨在經世，在行仁，所以康氏在課堂所講皆「中外政治之故」，「救中國之法」。他講課時的情形，梁啓超、歐榘甲等均有描述，謂康氏在論及「國事杌隉，民生憔悴，外侮憑陵，輒慷慨欷歔，或至流涕。」㊿「而學生聞之，早已泣不成聲，」(71)影響甚深。學生的抱負流露在彼此來往的贈詩中，表露在月夜郊遊的情懷中，與對現實不滿的言行中。如梁啓超赴北京與李端棻之妹結婚時（一八九一年十月），陳千秋贈詩一首，詩中充滿了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氣概：

……………………………

非無江湖志，跌宕悉游遣。

蒼生慘流血，敝席安得煖。

康有為則更明白地希望梁氏小心結交同志，以便從事救國事業：

……………………………

小心結豪俊，內熱救黎元。

憂國吾其已，乘雲世易尊。

賈生正年少，跌蕩上天門。(72)

光緒十八年夏，梁啓超函汪康年，自稱「稟性熱力頗重，用世之志未能稍忘。」是年除夕，又告汪說：「半載以來，讀書山中，每與諸同志縱論時變後，息慮而熟思之，竊以為今日時事，非俟鐵路大興之後，則凡百無可言者。」(73)可見關心國事，已為草堂風尚。

㊾ 徐勤：「日本横濱中國大同學校學記」，在戊戌變法，册四頁519。

㊿ 「梁譜長編」，頁40。

(71) 李少陵：歐榘甲先生傳（臺北，民四九），頁13。

(72) 「梁譜長編」，頁18。

(73) 同上書，頁19。

更可貴的是他們並不以高談濶論爲滿足，而能躍躍然欲付諸實踐。如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南海縣銀塘鄉「同人團練局」主管巨紳與地方盜賊勾結分肥，搶家刼舍，蹂躪地方，鄉人敢怒不敢言。康氏族人促其返鄉協助治盜。康乃以此事問于學生。陳千秋進言曰：

吾窮天人之理已至矣。已無書可讀矣。惟未嘗試于事。吾等日講仁，何不假同人局而試之。是亦一國土地。行仁施愛，先自近始，開學以敎之，闢蠶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一歲而化成，然後委之謹愿者守之，吾復可治吾學矣。」⑭

梁啓超嘗「勸其留身以效于國」，千秋則曰：「但推惻隱之心，以行吾仁，不計禍患，不計大小，不計成敗。」⑮康氏贊其言，乃返鄉。畢竟書生論政，紙上談兵。陳千秋的抱負雖宏偉，因缺乏實際的經驗，所以鬪不過銀塘鄉的地方惡霸。結果康氏敗走，陳千秋因此致病，年餘後逝世，沒有成效。但「不歆淨土，不畏地獄」的精神，使他們繼續奮鬪下去。光緒二十一年，他們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陳論時局，二十三年在湖南推行新政，二十四年在北京變法維新，此皆一本春秋經世關心國是的精神。此一精神，在當時的一般書院中是少見的。

七、學生及其救國活動

萬木草堂在長興里時期（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學生人數不足二十。多數爲十五至十九歲，僅二、三人超過二十歲。這些天眞爛漫的青年，志氣高，抱負大，彼此相愛如手足，而康氏視彼等如子弟。據估計，正式拜弟子的，雖約爲五十人，⑯但光緒十八年以後，從游者比年增加，從是年的「學者漸衆」，十九年的「學者來日衆」，至二十四年的「徒侶雲集」，「動至數百千人」。⑰可知其弟子一直在不斷增加中。

⑭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26。

⑮ 同上書，頁28。

⑯ 蔡俊光：記康南海與萬木草堂，在春秋雜誌，期八頁10。

⑰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23,25,45及「梁譜長編」，頁17。

康氏的弟子，經初步調查，知其名者五十一人，玆先將其姓名、字號、籍貫、出身背景列表如下（其經歷與著述見註文）：

姓名	字號	籍貫	出身背景	入學年月
陳千秋 (1870-1895)	字通甫 又字禮吉	南海	學海堂肄業	光緒十六年六月
梁啓超 (1873-1929)	字卓如 號任公	新會	學海堂肄業，舉人	光緒十六年八月
徐勤 (1873-1945)	字君勉	三水	庠生	光緒十六年底
韓文舉	字樹園	番禺	監生	光緒十七年
韓銘基				光緒十七年
梁朝杰 (1878-？)	字伯雋	新寧	舉人	光緒十七年
曹泰 (1872-1893)	字著偉	南海		光緒十七年
王覺任	字公裕 又字鏡如	番禺		光緒十七年多
麥孟華 (1874-1915)	字孺博 號蛻庵	順德	學海堂肄業，舉人	光緒十七年多
麥仲華 (1876-1955)	字曼宣	順德		
伍憲子 (1877-1960)	原名莊	南海		
歐榘甲 (1869-1912)	字云樵 號伊文	惠陽	附生，父業商	光緒十七年
譚錫鏞	字柏笙			光緒十七年
林奎	字慧儒			
龍澤厚	字積之	廣西 桂林	知縣	光緒十八年正月
韓曇	字雲臺	番禺		光緒十八年
湯覺頓 (1878-1916)	原名叡 又名爲剛	番禺	父任官	光緒二十年
梁應騮	字少閑			

陳國鏞	字侶笙			
梁君可				
錢定安				
鄺壽民				
梁小山				光緒二十一年前
張伯楨 (1880-？)	號滄海、篁溪、次溪、子幹	東莞	縣學生，祖父官參軍，外祖父業商	光緒二十二年
劉楨麟	字孝實	順德		
羅伯雅	字潤楠	番禺		光緒二十二年前
葉衍華		東莞		光緒二十二年前
葉覺邁	字湘南 號仲遠	東莞		
陳繼儼				
康同勲		南海		光緒二十二年前
梁啓田	字君力	新會		
梁伯鳴 (？-1911)				
潘若海 (1870-1916)	原名之傅	番禺		
潘藻鑑 (？-1897)	字鏡函			
鄧百村				
陳汝成	字默广			
陳和澤	字蔭農			
陳遜宜				
麥鼎華		順德		
龍伯純				
張學璟	字智若			
梁炳光	字子剛			

羅普	字孝高	順德		
羅惇曧（?-1924）	號癭公	順德		
洪年				光緒二十二年前
紀景福				
刁宸英				
林纘統		瓊州府崖州	舉人	
陳介叔	字士廉			
鄧元翊	字蔭南			
盧毅安				

⑱

⑱ 關于草堂弟子的姓名與有關資料，散見于康南海自編年譜，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諸家與康南海函札，蔡俊光記康南海與萬木草堂等資料之中。尤得 Lo Jung-pang: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pp. 481-513 人名錄的幫助最大，特此致謝。

關于草堂弟子的事蹟與著作，補充如下：

陳千秋：有學問，有胆識，勇于任事，曾任草堂學長，助理教學及編書，為康氏最欣賞之弟子，曾譽其「聰明絕倫，而氣魄剛毅，大道完成，為負荷第一人」（見康南海自編年譜，頁29）。

梁啓超：在草堂曾充當過學長，亦助理過編書，他在民清政治學術文化思想上，是位多采多姿的人物，亦是草堂弟子中最有成就的一位。他自稱萬木草堂是他一生事業的基礎。他的著述很多，研究他的著作亦不少。他主編過：中外公報、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報、政論、國風報、庸言、大中華雜誌、西政叢書。遺著有：飲冰室文集、清代學術概論、梁任公先生最近言論集、梁任公近著等（見張明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參考書目）。

徐　勤：入草堂時，約十八歲，家頗富有，且為人慷慨好義，曾助草堂租賃房舍及刻書。康說：「君勉急朋友之難，常供養朋友之才賢者，以及刻書移草堂之費皆任焉，幾以任恤破其家矣」（見康南海自編年譜，頁25）。他亦任過學長，助過編纂，為學很勤，康譽其「堅苦强毅，以進于成」，無富家子弟氣習。歷任澳門知新報主筆、橫濱大同學校校長、廣東國是報、香港商報等經理，隨康氏二十四年，共患難者十五年，志行高潔，國爾忘家，康贊之說：「抑若徐勤之志行，以中國為其自任，毀家殉之，早作夜思，車行舟游，周歐美亞海內外，日為函萬言，五升之飯不飽，無一非國爾忘家者。二十年中雖敗不捨，雖勞不倦，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其待吾至忠且敬也……黨人數十萬……莫不信其志芳而行潔，至公而無私也。」（見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五頁7）。徐勤的著作多屬政論性短文，今所見于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者有下列十五篇：「中國除害議」、「地球大勢公論總序」、「總論亞洲」、「

中國盛衰關于地球全局」、「日本橫濱中國大同學校書後」、「擬粵東商務公司所宜行各事」、「論日本自強之故」、「論俄國不能混一亞東」、「二十四朝儒教會黨考序例」、「春秋中國夷狄辨原序」、「孟子大義述自序」、「除無教之害」、「日本橫濱中國大同學校學記」、「除不學之害」、「春秋存中國說序」。

韓文舉：筆名捫蝨談虎客，入草堂時，年紀很大，故梁啓超說「樹園……吾黨中最長者也」，但思想很激進，光緒二十三年，執教于湖南時務學堂，傾向于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學生批語中批評中國二千年來的君臣關係爲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稱贊美國上議院能奪總統職權，英國議院可廢其君，而說：「舜亦由民公舉，非堯能私授也。」他看到將來世界政治潮流必以美國爲臬鉢，而批曰：「將來大一統者，必由美國以成也。」（見蘇輿：翼教叢編卷五頁6-11）。庚子後，與梁、徐、歐榘甲等主張以革命手段推翻滿清政府，在新民叢報中寫「捫蝨談虎」，及「人肉樓」等文，宣染革命。（見伍憲子：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頁39）。晚年在廣州城西設覺是草堂，一本康門遺風（見春秋雜誌期八頁10）。文舉著作，除上述諸文外，尙有五篇收于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中：「國朝六大可惜論」，「童蒙藝塾說」，「治始于鄉說」，「推廣中西義學說」與「萬國公政說」。由上舉諸文，可知他主張政治革新，鄉村自治，學術開放；奬勵私人興學，普及教育，倡導西政西藝等。

曹　泰：傾向于佛理的研究，康稱其「精于妙悟」，近禪宗，以赴羅浮山求道，患瘴氣病死于光緒十九年十月。著有「緯書言天並有輪廻之說考」及「命說」二文。另有日記兩本，存龍澤厚處（見龍澤厚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七日致康南海書）。

王覺任：著有「開儲材館議」、「論列國息爭之公理」、「寢兵說」等文。主張廣開學校，推行知政爲富強之本，反對先強後富的說法（見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册二頁389-92）。

麥孟華：號蛻庵，筆名曼殊，先憂子，傷心人等。很早就隨梁啓超活動，凡中外公報、強學會、保國會等活動，他都參加。後又協辦時務報。文章有：「論中國變法必自官制始」、「權署議內地機器製造貨物征稅章程書後」、「民義自序」、「民義總論」、「論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尊俠篇」、「論中國會匪宜設法安置」等（以上見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公司」（見時務報册三〇、三四）。此外，譯日人松平康國著英國憲法史，及山本利喜雄著俄羅斯史（見張明園：廣智書局，一九〇一～一九一五，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二，頁404,409）、「蛻庵詩詞」等（見張伯楨：憶麥孺博先生，在戊戌變法，册四，頁282）。

麥仲華：孟華之弟，康長女同薇之夫。戊戌春編皇朝經世文新編刊行于世。又譯美人扎遜：歐洲十九世紀史（一九〇二），（見張朋園：廣智書局，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二頁409）。

龍澤厚：桂林人，光緒十八年正月以知縣引見過粵，因「呼號憂世」欲「救天下」而來見康，拜爲弟子。光緒二十年，康避難桂林，係住澤厚家，康返粵後，留桂林主聖學會事。戊戌政變後被通緝，但轉往上海活動，光緒二十六年曾參加唐才常發起的國會（見梁譜長編頁131）。

伍憲子：筆名夢蝶，主編過香港商報，早期尙無聲名，民國三十四年，徐勤逝世後，一躍而爲中國民主憲政黨黨魁。著有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民五二）。

歐榘甲：筆名太平洋客，無涯生。祖業商，家道小康，少年時或受其祖父之影響，而有反抗滿清的意識。十五歲至十九歲，就讀于鄧承修的崇雅書院。光緒十三年補博士弟子員。十七年，得鄧之推薦，入萬木草堂，讀書頗認眞，曾作「長興語錄」，逐日記康講學要旨數百條。光緒二十二年前在上海助理

時務報編輯，二十三年入湘執教時務學堂。戊戌後赴日，思想轉爲急烈。戊戌前後寫有：「論中國變法必自發明經學始」、「論大地各國變法皆由民起」（以上原載時務報）、「論政變爲中國不亡之關係」（原載淸議報），「變法自上自下議」、「日本高等師範學校章程序」（見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光緒二十八年應聘爲舊金山文興日報主編，撰新廣東，主由廣東之自立而擴及全國各省之獨立，進而推翻滿淸政府。旋又任舊金山大同日報編輯，撰「觀戲記」，主改良舊劇，以鼓舞革命精神，改造國家。光緒二十九年冬離美返港，旋赴南洋，任新加坡南洋總滙報事，撰「商會應辦之事」一文。對華商之組織與發展頗有貢獻。三十三年，知保皇運動無望，放棄政治而擬返國創辦實業。先擬開發海南島，不成，轉赴廣西組織振華實業公司，又不成。退隱淡水故鄉（見李少陵：歐榘甲先生傳）。

湯覺頓：光緒二十年入草堂，二十二年冬與徐勤赴日任敎大同學校。戊戌政變後，止足海外，與梁啓超共事者十餘年，研究學術、政治、經濟等學，著述十餘萬言。間曾返滬助傳敎士李提摩太翻譯（見梁啓超：與李提摩太書，在戊戌變法，册一頁417)。民國二年，出任中國銀行總裁。民國五年，討袁運動，與徐勤赴粤說龍濟光獨立，遇難身死。覺頓事母至孝，自奉刻苦，濟朋友之難如其私，有俠氣，亦草堂敎育成功之例證也（見梁啓超：番禺湯公墓志銘，在飲冰室文集，卷七五頁10）。

張伯楨：光緒十九年，梁啓超在東莞講學，伯楨從之學，讀新學僞經考而景仰康有爲，二十二年由梁介紹入草堂，曾助校孔子改制考。戊戌政變後返東莞從事敎育。二十九年春，康由南美返港，張伯楨往謁，康邀同行赴印，以敎務不成行。三十一年春，自費留日，八月入法政大學高等研究科，二年後，學費無着，擬返國，梁啓超知之，乃請康按月資助，卒得結業（但沒取得學士文憑）。宣統元年歸國，考授法政科擧人，供職于法部，爲草堂弟子爲政府工作之一人。但伯楨「發言伸民權，執筆討民賊」，不爲當道所喜，復以政局紊亂，個人無能爲力，而隱歸佛禪（見張伯楨：壽南海先生一文，在張伯楨：焚餘草，詩，頁7及愁思集頁1。又見敎育部檔案，民前各省派遣留日學生名册，廣東省部份）。遺著有：「南海康先生傳」、焚餘草、篁溪家譜等，均收歸在其所編之篁溪叢書中。

錢定安：大同書校訂者，于民國二十四年將該書全稿交中華書局出版，始銷行于世。

韓　曇：曾輯逸周書、穆天子傳與山海經，以證劉歆之僞，十九年冬與梁去東莞講學，後任東亞報主編（見 Lo Jung-pang: K'ang Yu-wei, p. 489）。

鄺壽民：庚子後在香港活動。

梁小山：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偕康梁入京應試。

劉楨麟：主革新，著有：「地球六大罪案考總序」、「論德人尋釁于中國」、「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地運轉于亞東論」、「論中國守舊黨不如日本」、「論暹王出遊」等文（均見于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復讎說」（原載知新報册四，今錄于戊戌變法册三頁166-69）。

陳汝成：橫濱大同學校敎習。

陳和澤：光緒十五年底，首先來見康氏，康贊其年雖幼，但頗有志氣。後任大同學校敎習。

麥鼎華：孟華之弟。民國二年，康曾令其與陳遜宜合辦不忍雜誌。譯有：美威爾遜政治汎論（一九〇三）、日人有賀長雄社會進化論（一九〇一）、柴四郎埃及近世史（一九〇一）、及中江力造中等敎育論理學（一九〇二），（以上譯書見張朋園：廣智書局，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二頁404,407,409,412）。

張學璟：光緒二十五年後，曾傾向革命，庚子之役，在廣東活動。

五十一人中較知名的有梁啓超、陳千秋、曹泰、徐勤、麥孟華、麥仲華、歐榘甲、韓文擧、葉覺邁、王覺任、伍憲子、湯覺頓、張伯楨等十餘人。

關于學生入學前的背景，雖無充分的材料，但從學生須繳學費、自理膳宿、與資助草堂租借房舍、刋刻書籍等事實來看，知道他們有一部份來自小康的家庭。陳千秋的家世比較艱苦，但入草堂前是學海堂的學生，享有公費。梁啓超的祖父是生員，做過敎諭，其父亦是位敎師。他自己曾在學海堂讀書，且是一位擧人。⑲徐勤是邑庠生，家庭似頗富有。歐榘甲的祖父與父親都是商人，家裏曾置田三百餘畝。⑳韓文擧、羅普都是監生。麥孟華原肄業學海堂，亦是位擧人。龍澤厚入學時是知縣。湯覺頓的父親當時任官廣東。張伯楨爲生員，其祖父曾官參軍，外祖父業商，家亦小康。㉑

由于他們的背景與當時的國際情勢，在入草堂以前，他們已屬于「覺醒」的一羣。康說「來學者多志士」，㉒正說明了他們的抱負。他們之拜康爲師，或由于敬佩他批評朝政的勇氣，或由于敬仰他的學問思想與政治主張，而願投身于未來的政治改革工作。

草堂的入學與結業，無明顯的期限，亦無所謂文憑的規定。事實上，于光緒二

梁炳光：光緒二十五年時，亦傾向革命，庚子與張學璟在廣東活動。梁啓超曾譽他們二人爲「熱心眞如一爐猛火，同門無及之者。」（見「梁譜長編」，頁109）。

洪　年：光緒二十二年負責認刻春秋董氏學與孔子改制考兩書（見洪年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致康書，在近史所藏諸家與康南海函札）。

紀景福：民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在陝西率眷遙祭康之神位，有「曩維師恩，視予猶子兮，矚金瞻地矢毋忘……回憶癸亥（一九二四）朧朔遠送別兮，潼河水急逝湯湯！」之語（見近史所藏諸家與康南海函札）。

刁宸英：于宣統二年曾作頌康海南夫子詞，有「七十二賢人，任公獨法守，……歐亞叱風雲，吾師轉樞紐……弟子爭步趨，瞻仰若山斗」之語（見近史所藏諸家與康南海函札）。

此外，康氏在桂林講學時的弟子有：況晴臯、況仕任、王濬中、黎文澣、龍志澤、李諫等人。因多隨其從事政治活動，特附於此。

⑲　「梁譜長編」，頁3-5。

⑳　李少陵：歐榘甲先生傳，頁5。

㉑　張伯楨：篁溪家譜，頁27,34,42，在篁溪叢書，輯二册四。

㉒　康南海自編年譜，頁23。

十年前，部份學生已開始短期離校活動去了。如光緒十九年，陳千秋去南海縣助地方人民剷除公害；梁啓超與韓曇去東莞講學等是。

草堂諸生參與政治活動的人數，在戊戌政變以前，約有十餘人，戊戌政變後，人心思變，參加者倍增。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二月五日，梁啓超在東京「偕同門三十餘人」向康上壽。時康表示國內弟子尙多，恐遭黨禍，函勸彼等來日留學，家貧者，亦給予資助，自此去日留學的「頗衆」，㊸然而，實際留在國內的仍佔大多數㊹。在國外的，因參加了實際行動，比較受人注意，而在國內的則因迫于環境，沒沒無聞。

草堂的教育是政治性的通材教育，因此，思想文字宣傳工作爲彼等所長。除曹泰一人較偏于佛學的冥思，病死于羅浮山外，其餘諸人，旣能從事政治社會改良工作，亦能從事新聞，出版與教育等事業。

如參與創辦各種學會的有梁啓超、徐勤、麥孟華、麥鼎華、陳汝成、羅惇曧、龍澤厚、梁朝杰等人；辦報的有梁啓超、麥孟華、徐勤、伍憲子、梁伯鳴、陳繼儼、梁文卿、歐榘甲、梁朝杰、梁君可等人；從事教育的有梁啓超、徐勤、韓曇、湯覺頓、葉覺邁、歐榘甲、韓文舉等人。

草堂教育由于缺乏專業訓練，後來因情勢所迫，欲興辦企業，而苦無「商才」。康梁等人所辦企業如上海廣智書局、香港商務公司、中華酒店、墨西哥華墨銀行等，所以全部失敗，缺乏商才，恐爲主要原因之一。

草堂諸生的政治活動，雖然始終在康氏控制之下，但亦發生分裂。康氏本人的思想，在講堂上是很激烈的，學生多受其激勵，但於戊戌受光緒帝的知遇，而有忠君保皇的決心。學生則由于受康氏民主、求變與愛國思想的啓蒙，及受實際政治情況所迫，而有傾向革命運動的。在甲午（一八九四）以前，陳千秋、林奎、何章（即何易一）及康廣仁等曾與孫中山晤面，商談合作問題，尤以林奎「極稱孫某」。㊺戊戌後逃亡海外，因受革命黨之運動，而曾經同情革命者竟居黨人「十之七八」

㊸ 康文佩編：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臺北文海，民六一，與康南海自編年譜同册），頁1。

㊹ 張伯楨：戊申光緒三十四年旅東寄懷粵中諸同志，（在張伯楨，焚餘草，詩，頁5）。

㊺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臺北，世界，民四三），册一頁1；梁啓超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京致康書，見諸家與康南海函札。

⑯，為首者為梁啓超、歐榘甲、韓文華、葉覺邁、梁啓田、張學璟、梁炳光、陳國鏞、譚錫鏞、麥仲華等人。⑰他們轉向革命的理由，實則受康氏「救國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時勢」，覺得革命「為今日救國救民之要著而已。」⑱

雖然有這種思想上的分歧，但康氏的弟子早年受其深刻的影響，感情上又不能擺脫康之羈縻，所以都能回頭接受康氏君主立憲的主張。

關于草堂諸生從事政治活動的具體情形，已有專書論述。⑲此處略而言之，康氏及門人的活動，最初是上書，曾發動會試公車數千人為之。稍後則組織學會，討論救國方法。再則創設報館，宣傳維新思想。而領導政治運動，尤需人才，因此，又創辦學校，培養幹部。培養幹部不足，又到處講學，結交同志，進而欲影響政治領導中心。戊戌之前，他們運動京官，爭取光緒皇帝，作由上而下的改革，但他們高估了光緒帝的權力，所獲僅一虛名。他們在草堂中亦講武學，但從未想到政治鬬爭而必須依賴武力。直到戊戌政變前夕，始悟此理。政變後逃亡海外，痛定思痛，成立保皇會，擴大海外組織，始有武裝起義的計劃。因在美國設立干城學校二十二處，聘請美國軍人荷馬李（Homer Lea, 1876-1912）等為教官，訓練華僑弟子近千人。⑳惜庚子自立軍之役失敗，此一頓挫又使彼等恢復溫和路線，講求君主立憲。民國以後，從事政黨活動，于政壇繼續有所影響。

總之，萬木草堂諸生的活動，經歷無數艱辛的旅程。論組織，由强學會、保國會、保皇會、憲政會、共和黨而中國民主憲政黨；論行動則由公車上書、戊戌維新、

---

⑯ 「梁譜長編」，頁158。

⑰ 同上書，頁88；亓冰峯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五五）頁47。

⑱ 「梁譜長編」，頁158。

⑲ 請參閱：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五三）；亓冰峯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六〇）三書。尤以張玉法的介述最為詳盡。

⑳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臺北，該會，民六一）頁469，按李將軍之號， 係康有為借光緒帝之名義頒授者。光緒三十年後，李將軍改助孫中山，從事革命。康氏自稱旅美憲政會在美設兵校凡二十二處，延美兵官教之，名以干城學校，學者千數，為激發彼等愛國革命之熱忱，特作干城學校歌，令學兵歌之（見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六，詩頁3）。

庚子勤王、請願國會、至民初的倒袁護國；論事業則有報紙、雜誌、書局、學校與企業。[91]

---

[91] 關于草堂諸生所辦事業的材料，除康南海自編年譜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外，在學會方面，參考王爾敏晚淸政治思想史論，頁135-162，與張玉法淸季的立憲團體，頁199-206；在學校方面，參考淸議報及張玉法書，頁237；報刋方面，參考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頁52，張朋園梁啓超與淸季革命，頁253-320，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北，學生，民五二？），頁123-154；企業方面，參考張玉法書，頁330-325與李少陵歐榘甲傳，玆依類列表如下：

學　會

名稱	地點	成立時間（光緒）	參加人數	康門參與者
强學會	北京	21.7.？		康有爲、梁啓超、麥孟華
强學會	上海	21.9.？		康有爲
不纏足會	廣州	21.？.？		康廣仁
戒纏足會	龍山	22.12.？	數百戶	陳汝成
戒纏足會	順德	23.？.？		羅惇曧等
聖學會	桂林	23.3.7	得官紳大力支助	康有爲、龍澤厚
不纏足會總會	上海	23.4.？		梁啓超、麥孟華、龍澤厚
聖學會	廣州	23.5.？		康廣仁
醫學善會	上海	23.秋.？		龍澤厚、梁啓超
粤學會	北京	23.12.13	二十餘人	康有爲
經濟學會	北京	23.12.？		康有爲
知恥會	北京	23.12.？		康有爲、梁啓超
保國會	北京	24.3.？	一八六人	康有爲、梁啓超、麥孟華、梁朝杰（況仕任）
祀孔會	横濱	24.冬.？	七四三人	梁啓超
戒鴉片煙會	横濱	24.春.？		梁啓超及大同學校學生
大同志學會	横濱	25.3.？		徐勤 ※
戒鴉片煙會	檀香山	25.2.？		
愛國學社	横濱	29.1.？		梁啓超
新會國文學社	横濱	32.8.？		麥鼎華、梁啓超

※ 大同學校爲總會，分會設兩廣、港澳各書局、報館及學會中。

報刊

名稱	發行地	發行起訖	刊次	主持人	銷售數	閱讀人數約數
中外公報	北京	光21.6～21.11	日刊	梁啓超、麥孟華	3,000份	?
强學報	上海	光21.11～22.6	日刊	康有為	?	?
時務報	上海	光22.7～24.6	旬刊	梁啓超(汪康年)	12,000份	120,000人
知新報	澳門	光23.1～25.10	旬刊	康廣仁、徐勤	?	?
淸議報	橫濱	光24.11～27.10	旬刊	梁啓超、麥孟華 陳國鏞	4,000份	40,000人
嶺海報	廣州	光27	日報	(胡顯頸)	?	?
文興報	舊金山	光28～宣統1	日報	歐榘甲、梁君可 梁朝杰、龍澤厚	?	?
新民叢報	橫濱	光28.1～33.10	半月刊	梁啓超、陳國鏞	9,000份	180,000人
新小說報	橫濱	光28.10～31.9	?	梁啓超	4,500份	4,500人
新中國報	檀香山	光30.～?	?	陳繼儼、梁文卿	?	?
時報	上海	光30.4～民10	?	羅普(狄葆賢)	?	?
商報	香港	光31～宣3	?	徐勤、伍憲子	5,000份	50,000人
南洋總滙報	新加坡	光32～?	?	徐勤、伍憲子	?	?
政論	東京	光33.10～34.7	月刊	梁啓超	2,000份	20,000人
啓南報	暹羅	光34.10～?	?	梁伯鳴	?	?
日新報	溫哥華	光34～宣統2	?	(何卓競、黃孔昭)	?	?
世界報	舊金山	宣統1～	日刊	梁朝杰、梁君可	?	?
維新報	紐約	?	?	?	?	?
國風報	上海	宣統2.1～3.8	旬刊	梁啓超、康有為 湯覺頓、麥孟華 (何國楨)	3,000份	30,000人

學校

名稱	地點	設立時間(光緒)	學生數	康門主持或執教者
東莞學堂	東莞	19.?.?		梁啓超、韓曇
萬木草堂小學	上海	23.?.?		梁啓超
女子學堂	上海	23.?.?		梁啓超
湖南時務學堂	長沙	23.7.?	40人	梁啓超、葉覺邁、歐榘甲、韓文擧
大同學校	橫濱	23.11.?	約160人	徐勤、湯覺頓、陳汝成、陳和澤、 林奎
商業學校	橫濱	24.9.?		梁啓超
同文學校	神戶	25.8.?		湯覺頓
橫濱女校	橫濱	25.?.?		康同薇
高等大同學校	東京	25.7.?	約300人	梁啓超 ※

域多利義學	加拿大	25.3.?	?	康有爲（李福基）
東文學校	澳門	25.?.?	?	何穗田
女童學堂	新加坡	25.?.?	?	（林文慶）
婦孺學堂	荷屬望加錫	25.?.?	?	（李連喜）
中西小學堂	南洋葛留巴	25.?.?	?	（邱爕馨）
輔仁學校	仰光	25.?.?	?	（李鳴鳳）
干城學校	美國西部	26.?.?	約 1,000人	康有爲，梁啓超等
明倫學校	檀香山	?	?	?
愛國學堂	紐約	?	?	?
廣東公學	香港	31.?.?	約 200人	梁啓超
南華公學	?	?	?	康有爲
南强公學	廣東	?	?	韓文舉
覺是草堂	廣州城西	宣統 ?	?	韓文舉

另外，據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保皇總會告同志書云，「南洋荷蘭各埠，近兩年來，開學堂甚多，本會所派往之教習，亦已二十餘人」（見梁譜長編，頁210）。康等在海外所設學校，均强調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與政治思想。如在南洋諸學校中，主張用中原音(卽今之國語)教學(見康有爲：南華公學序)。

※ 按東京高等大同學校于光緒二十七年三月易名「東亞商業學校」，廿八年又改爲「清華學校」，學生四十餘人。

書　局

名稱	地點	成立時間（光緒）	資本	主持人
大同譯書局	上海	23.?.?	?	康廣仁
廣智書局	上海	27.11.?	十六萬元	梁啓超、（何天柱）
大同譯書局	橫濱	28.?.?	約六萬餘元	梁啓超

企　業

名稱	地點	創辦時間（光緒）	資金	主持人	附註
商務總公司	香港	29.?.?	股金 598,760元	康有爲（何穗田）	此爲總企業公司，以下爲關係企業
中華酒店	香港	32.1.?	股金 40,000元	徐勤	
華墨銀行	墨西哥	32.4.?	股金 937,000元	康有爲	因墨西哥地價大跌而罷
電車	墨西哥	32.?	?	康有爲	同上原因致停辦
華益公司	香港	?	200,000元	?	經營不善，虧累
華益公司	紐約	?	58,000元	?	
琼彩樓餐館	支加哥	?	56,500元	?	
振華實業公司	廣西	33.?	3,000,000元	歐榘甲 梁應騮（劉士驥）	計劃開採天坪山銀礦，設銀行，航路，鐵路，墾荒地等，因劉士驥被刺而罷

在草堂諸生所辦事業中，學會與報刊所佔比重最大，學校次之，企業則因心有餘而力不足，比重最小。計前後創設報刊十九種以上，參與者多達十四人；設學會十三個，分散二十處，參與者十人；辦學校二十一所以上，參與者七人；書局與企業，雖集資達五百一十餘萬元之譜，而實則委託他人經理，康、梁等不過掛名而已。歐榘甲與梁應騮後來雖欲轉于實業，但因變故而未能實現。

再者，草堂諸生，由于逃亡海外，故所辦事業，在國內者反居少數。如學會二十處，設在海外者十四處，在國內者僅六處；報刊在海外發行者十二種，國內者七種；學校設在海外者十五所，國內者僅六所。戊戌後，國內的機構幾乎不能存在，彼等活動之困難情形可想而知。

結　　論

萬木草堂爲康有爲私人的講學機構，其性質近似政治幹部學校。設立于光緒十七年，結束于戊戌政變失敗之後，數年中，艱苦經營，培養了一些政治人才。其救國救民的大目標雖未達到，但就教育功效而論，則相當成功。

著者在前言中提到，清代書院迄張之洞而有鉅大的演變。故張氏所設書院，堪稱正統教育之中堅。而萬木草堂的教育則有所不同，其不同之處，唯有與張氏所辦書院比較之後，始能得見。

在教育目標方面；張氏所辦書院，爲培養「出爲名臣，處爲名儒」的人才。據輶軒語與勸學篇，這種人才的理想典型是：學問博古通今，中體西用；品德孝悌忠信，溫良恭儉讓；政治思想，尊君愛國，反民主，抑女權；崇敬古今聖賢學者，不妄加批評；對政府與社會，主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萬木草堂所欲塑造的人才典型，則頗有差別：在學術思想上，是獨立自主，能有創見；宜學貫古今中外，以救國救民爲旨歸；其品德孝悌忠信，慈悲任恤，博愛及物，勇于犧牲，勇于實踐；其政治思想主張君主立憲，既尊民權，亦重女權；敢于批判傳統積習，懷疑權威；對政治與社會現實，正面觀察，力求改進；不孤芳自賞，而重視合羣。

在教育內容方面：二者亦不相同。草堂教育包括儒、佛二教及中西政治學術，

而張氏所辦書院，雖亦主「博古通今」、「明習時務」與「政藝兼學」，實則排拒佛、耶、民主政治與西方哲學思想。在讀經方面，張氏遵循着漢、唐以來的門徑，兼讀漢、宋傳注，而訓詁考據爲必須。其讀經次序爲：由毛詩、三禮（儀禮、禮記、周禮），而尚書、春秋、易經。于春秋三傳則主並立，無所偏依。㉒

草堂則主由先秦諸子而讀經，讀經不重章句訓詁，而重義理。所謂義理，「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創法立制之精意」。因此，其讀經次序爲：先讀春秋，以知孔子改制之意，而後讀三禮、詩、書、易。春秋以公羊穀梁爲據，而排斥左傳。㉓至于讀史的次序，二者相同。但史觀迥異，張氏書院不許「妄議論古人賢否，古事得失」，亦不許「批評文章」。㉔而草堂則強調衡論人物是非，制度得失，以爲經世之參考。

在學術與集會自由方面：張氏所辦書院無學術集會自由可言。如規定學生聽課時，只准筆問，聽候批答；所問須在「所授之書」，「所講之義」的範圍內，不得「蔓引游談」，與教習辯難。讀書劄記時，不得「自發議論」；更不得「詆毀先賢，妄談時政」，「干預外事」。㉕晚間，學生不許竄房，或自由集會，討論問題。後各書院設有專門教習，監督學生言行。由于有種種學術與行動上的精神枷鎖，學生的學習與社交活動，缺乏生氣。各書院雖不乏憂時愛國之士，密秘集會，然爲院規所不許。草堂則無此約束，學生可自由集會，討論問題，互相學習，彼此批評。對先聖先賢，清朝學者，政治弊病，社會風氣，均可批評。使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充滿生機與活力，因此身心愉快，學業進步。

簡言之，正統書院，重個人功名，因循與保守。而草堂教育則重社會革新、求變與解放。此兩大教育精神，自草堂設立之日起（一八九一）開始互相激蕩。數年間，草堂的教育主張，由于學生的努力傳播，自廣州而東莞（梁、韓東莞講學），而北京（強學會），而上海（上海萬木草堂小學），而桂林（康、龍桂林講學），而湖南（時務學堂及徐仁鑄輶軒今語），而橫濱（大同學校）。由震蕩全國而衝擊

㉒ 張之洞：輶軒語，在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民五二）頁3760，「治經宜有次第」條。
㉓ 長興學記，頁27-27，「說經」條。
㉔ 張之洞：輶軒語，在張文襄公全集，頁3762，「讀史忌妄議論古人賢否古事得失」，「讀史忌批評文章」二條。
㉕ 張之洞：兩湖書院學規課程（一八九七），在湘學新報，「課程章程」。

海外華僑社會。葉德輝說，康氏的「長興學記」與徐仁鑄的「輶軒今語」，「立法至簡」，「卒業至易」，「煽動一時之耳目」，加以有上下奧援，散佈很快。[96]若令其自然發展，將動搖正統教育之根本。因此，他呼籲清政府立即加以鎮壓。隨着戊戌變法的失敗，草堂在教育上的影響卽行消失。

草堂在教育思想上的衝擊，雖至戊戌而終止，但在政治及文化思想上的影響，則繼續迄于民國以後。梁啓超及其同門，「對辛亥革命不無間接的貢獻。」[97]對淸末民初的立憲運動與政黨形成，亦有直接的關係。[98]

在文化思想方面，由强學會（一八九五）所引起的反應，波瀾壯濶，三、四年間，各地所設學會，如雨後春筍。[99]廣泛地激起知識分子的覺醒。

總之，學術與政治人才教育，其良窳端視精神、宗旨與圖書設備而定。而尤以精神與宗旨爲成敗之關鍵。萬木草堂在組織、經費與設備方面，遠不如國內一般著名的書院，而其成就則遠過之，這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個破天荒的創學。[100]

---

[96] 葉德輝：「長興學記駁義」，在蘇輿翼教叢編，卷四頁35。

[97] 張朋園：梁啓超與淸季革命，頁329。

[98] 張玉法：淸季的立憲團體，頁510。

[99] 同上書，頁199-206；又王爾敏晚淸政治思想史論（臺北，民五八）頁135-162。

[100] 梁啓超在康有爲傳中說：「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逮于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于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舉。」（見戊戌變法册四頁10）。